

历史

关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 两处重要译文的新译

高晓惠

【内容提要】《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翻译工作始于1953年，止于1959年。二十多年后，中央编译局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出版后发现的问题及苏联出版《列宁全集》的最新成果，决定对第一版译文进行全面校订。在这次校订过程中有两处重要译文进行了新译，其中之一是把“党的文学”改译成“党的出版物”，其二为“爱国主义是什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两处重要译文的改译充分证明了深入研究列宁经典著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列宁 列宁全集 党的出版物 爱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H3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3)03-0061-0010

经典著作的翻译，既是一项政治任务，又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学术工作，因此，对翻译本身必须有更高的要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53年特别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中央编译局），专门从事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这不仅大大推进了经典著作的翻译，而且大大提升了经典著作的翻译水平和层次。中央编译局成立后不久开展的第一项工作是翻译《斯大林全集》。通过对《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的试译试校，很快总结出中央编译局所遵循的一个最基本的翻译标准。中央编译局老局长师哲曾提出翻译要反对两种倾向，既要反对那种貌合神离、似是而非的翻译，也就是译文似乎很流畅、很通顺，实际上却歪曲了原意，又要反对那种硬搬死译的翻译，也就是译文佶屈聱牙，令人无法正确理解。后

来，中央编译局在翻译经典著作的实践过程当中，把这一观点概括为“意思正确，文字通顺”的基本翻译标准。这个看似简单，然而却是高度概括的标准，要真正做到并非易事。

与《斯大林全集》一同上马的还有《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的翻译工作，这也是中央编译局成立后第一项大规模开展的经典著作全集的翻译工作。《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共三十九卷，以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编辑的《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及其“补卷”为蓝本。这一版的翻译工作于1953年下半年开始，整版各卷在1955—1959年间出齐（第三十九卷出版于1963年），收载文献4285篇，共约1500万字。在短短5年的时间里完成《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的工作，堪称大跃进式的速度，事实上，这也确实是1958年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

【作者简介】高晓惠，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跃进”方针的产物，同时于1959年全部完成，也是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列宁全集》的翻译出版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对在我国传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起了巨大的作用。单从印数上说就达到247万册。然而，中文第一版的不足无疑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由于这一版是根据苏联《列宁全集》第四版编印的，中文版本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苏联《列宁全集》第四版有大量列宁文献没有收入，特别是相当多的十月革命后的文献没有收入；文献的校勘和编排都有不尽合理之处；参考资料方面不仅过于简略，而且有些表述和提法不当，带有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色彩。其次，由于第一版的准备和翻译工作非常仓促，时间过于紧迫，许多卷的翻译和编辑工作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同时上马并完成的；同时由于编译局的译校队伍在当时还是一支相对比较年轻的力量，经验和水平不足，因此造成在译文方面难免存在不少问题，有误译、漏译和错译的情况。

差不多在二十年之后，中央编译局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出版后发现的问题以及苏联出版《列宁全集》的新成果，也即《列宁全集》第五版提供的更多的新文献和更准确的资料，决定出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除翻译了大量新文献外，主要是对第一版的译文进行全面校订。从整体上说，第二版翻译译文更加准确。如果说小修小改无法计数的话，那么几处重大的修改，不仅在翻译上引起争论，而且在理论界也引起强烈反响。同时，在专有译名的统一、在译语的处理上也下了不少工夫，许多重要译名译语的修订经过多方讨论得以修改和确定。此文即着重介绍中文第二版修订中两个重大译名的修改情况，以便记录下编译局为第二版工作的同志们的成果。

一、是“党的文学”还是“党的出版物”

了解列宁著作的人，只要看到这样的小标题就会知道这里说的是哪一篇文章，指的是哪一处修改，这就是现收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十二卷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该文旧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在一个不算短的历史时期内，旧译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尤其是深刻地影响了中

国的文学艺术界，一直被视为列宁论述文学、艺术以至美学问题的经典之作。《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改译的关键是以“出版物”取代“文学”。

此文改译是因为其中的俄文关键词 *литература*。俄文 *литература* 源于拉丁文 *litteratura*，该词已成为欧洲国家语言如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西文的同源词。*литература* 多义，其含义有：泛指一切形成文字的东西，即书面著作；作为出版物的总称；专指一切形式的文学作品。然而，即便是多义词，西文之间的翻译，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只需用同源词取代即可，而中文则不能简单地这么做，中文翻译需要对多义词的词义做出选择，选择其中最恰当的一个，如果选择不当就会产生歧义，甚至出现错误。

此文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被介绍到中国来了。1926年12月6日上海《中国青年》杂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第6卷第19号第144期刊载了署名“一声”的节译，题目为《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①，译出了除开头5个自然段之外的绝大部分内容。这个译本虽然也出现了“文学”一词，但也使用了“出版物”的用字，说明译者考虑到了 *литература* 一词的多义性。然而，在此后出现的多种译作中，*литература* 却始终只翻译成“文学”了。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列宁著作的翻译实践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据记载，1942年5月召开著名的文艺座谈会时，博古应毛泽东之邀翻译了列宁的此文作为马列主义文艺经典著作供座谈会学习。这是第一个以《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为标题、包括14个自然段的全译本。据当时的见证人、时任《解放日报》社文艺编辑的黎辛回忆说，博古问我，*литература* 是什么意思。我说是文学，也是个多义词。博古说它是个广义词，可以指报刊、书籍、文献等；并说列宁这篇论文主要谈的是文学问题，因来不及在这篇文章中仔细推敲它的其他含义，暂且通统译为文学了，以后再考虑准确地区分其含义。译文发表在1942年5月14日《解放日报》的副刊上。博古还为此写了一个“译者的话”，其中说，“在

^①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之间的插图（书影）。

十月总罢工的基础上,产生了第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工人们用革命手段自动地实现民主改革,藐视政府和法律,实行了言论出版的自由。这便使合法的和非法的刊物之间的区别开始泯灭了,这便使列宁尖锐地提出了党的文学的问题。”^①这段回忆表明,曾考虑过 литература 一词的多义性,但遗憾的是并没有深究下去。而且这个“译者的话”,细究起来自身是有矛盾的。博古所说的背景是对的,也即在1905年革命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治自由的措施,有了言论出版自由,并使合法的和非法的刊物之间的区别开始泯灭了,但列宁为什么在利用这个合法条件的时候单只“尖锐地提出了党的文学的问题”,而不是党的其他方面的更重要的问题呢?这从逻辑上有些解释不清。这里,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党的文学”(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的问题,也就是把党与文学联系在一起。

一直到重新校订《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之前,литература 的“文学”译法一直未变,译者中包括许多名人,如著名苏俄文学翻译家戈宝权,原中共早期领导人、革命家瞿秋白,诗人萧三、周扬和曹葆华等。即使到中央编译局翻译《列宁全集》第一版时也沿用了这一译法。如果从20世纪20年代算起,到20世纪80年代最终由中央编译局自己修改译文时止,列宁此文的这一译法通行于60多年。而“党的文学”的影响已经深入我国的文学艺术界,其中起首要作用的是毛泽东。前面说过,毛泽东建议博古翻译此文,之后就在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两次加以引用。在“讲话”中第一次提到时说:“列宁还在1905年就已经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第二次时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②可见,当时毛泽东引用时受了“党的文学”这一译法的影响,或者说这一译法恰与毛泽东当时想赋予党的文学的内涵十分吻合。无论如何,毛泽东的“讲话”是指导我国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对我国文艺发展的影响极其深远,列宁的此文也借此在我国文学艺术界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和不断深入的解读。除了毛泽东引用和提到的文艺为劳动人民服务、文艺是齿轮和螺丝钉的论述外,我国的文学

理论家、文学史家还充分地论述了似乎是列宁提出来的党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文学和艺术的党性原则,等等。

实事求是地说,对列宁此文在翻译上出现的这种偏差以及对我国文学艺术的影响并非为我国所独有,在苏联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理解列宁此文也是由来已久。一般来说,凡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的专题文集必收入此文,如苏联1938年出版的《列宁论文学与艺术》是这样;斯大林去世后,1957年由苏联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也是这样,这本书,我国于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的序言《弗·伊·列宁和文学问题》中说,列宁的这一著作“制定出了文学的党性这一重大的原则”,“规定了艺术创作者的新任务”^③。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即在1990年苏联出版的一本由莫斯科国立印刷大学出版的《编辑理论与实践》的书中,有一专门讲“列宁作为编辑”的章节,其中评价此文为俄国和世界美学思想的著名文献,说它全面论证了文学、艺术、印刷、出版事业的党性原则^④。

这些事实表明,列宁此文自问世以来,对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文艺领域的指导性意义,它提出的党性原则,成了此文的基本内涵。但这样的理解并不排除存在不同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学术界,包括文艺界对列宁的此文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这场讨论涉及许多问题,但其中的一个争论是,列宁此文的党性原则针对的是什么?

1956年Я.М.斯特罗奇科夫在《历史问题》杂志第4期发表了题为《论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⑤一文的文章,引发出有关争论。文章的主要观点认为,列宁在宣布党性原则时,似乎仅仅指的是党的报刊、党的出版物,而党性原则对文学是不适用的。他的文章遭到部分苏联学者的反驳,如З.И.盖尔什科维奇,后者在《涅瓦》杂志1957

① 黎辛:《博古与〈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翻译》,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1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1、865—866页。

③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1页。

④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печати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редактирования, <http://www.hi-edu.ru/e-books/xbook030/01/index.html?part=002.htm>

⑤ 在介绍有关争论时仍采用旧译。

年第8期上发表题为《要正确地解释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的专论,认为列宁的文章既谈到了与党的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直接有关的书刊工作,也谈到了文学和艺术。而且党性原则,一方面适用于党的报刊,另一方面也适用于一般的文学创作。

然而,争论归争论,那么列宁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此文写于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中。在这场革命的推动下,沙皇政府颁布了“十月十七日宣言”,给予社会一定的言论、信仰、结社和出版自由,这为列宁及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活动创造了合法的条件,当然也为党的出版活动提供了合法条件。列宁认为,利用得来不易的合法条件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非常重要。在革命形势下,列宁于1905年11月8日(俄历)辗转从国外秘密回到了俄国,回国后立即主持已经成为布尔什维克第一个合法机关报《新生活报》的工作并为该报撰稿,连续发表了《论党的改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社会主义和宗教》等十几篇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就是其中的一篇。

列宁此文大致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第一,列宁谈到了时代的背景,也就是说对于党的出版物来说,存在的条件改变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出版物(包括报纸、刊物、书籍、传单等)过去都是非法(秘密)印制、发行的,其中不少还是在海外印行,然后偷运回俄国并秘密分送。列宁在此文中指出,由于沙皇专制制度这种“亚洲式的”、“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造成了“伊索式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不得不采取比喻、伪装、隐讳、暗示等手法来宣传自己的观点,从而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宣传工作带来困难,因此称这是个“该诅咒的时代”。如今,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党的出版物,如《新生活报》能够合法或半合法地出版了。虽然,这个自由在事实上是很短暂的。

第二,列宁提出了党的出版物的任务。党的出版物,正由于它是“党的”,它作为党的喉舌,所以应该坚持“党性”原则。根据结社自由的原则,既然你自愿加入到了党这个联盟组织,就要执行党

纲、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就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宣传党的观点;如果作为一个党员鼓吹和宣传反党观点,那么就应对其采取组织措施,直至清除出党;党的报纸、杂志、出版社等宣传机构都必须接受党的监督,向党报告工作;等等。由此,列宁赋予党的写作事业以崇高的地位,“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

列宁在这里之所以特别强调党员作者的党性原则,主要还是出于同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各种思潮斗争的需要,这里主要是针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也有针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为了掩饰其阶级利益和目的,竭力把自己装扮成“全民的”政治代表,宣扬超阶级、超党派的“无党性”思想,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鼓吹“创作的绝对自由”、“批评自由”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列宁尖锐地指出,“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这里列宁提出一个带有一般性意义的观点,他认为:

“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来说,列宁认为,上述资产阶级思想也是有影响的。当时形式上还处于同一党内的孟什维克的一些作者在自由派报刊上发表违反党纲的言论,如普列汉诺夫就凌驾于党之上,独自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这样就出现了“著作家置身于党之外,党之上”,“党是党,著作家是著作家”这种局面^①。甚至在《新生活报》上也出现了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与党的世界观相抵触的文章,列宁因此怒斥“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

第三,列宁在此文中也分析了写作活动的特点,他指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最不能搞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最来不得公式主义。列宁认为

^① 《列宁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页。

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固然如此,列宁着力批评的仍是那种“思想创作绝对自由”的观点,他认为,“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这里列宁的说法之所以这样绝对,仍是出于党派和阶级的利益,以批判资产阶级为宗旨。

由此,很清楚,列宁在此文中所强调的党性原则应该是,对于一个政党的成员来说,自己的言行要讲党性,要有党员的原则标准,有党的纪律。然而,如果说这种党性原则对于党的同情者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还适用的话,那么对于非党人士来说则没有约束力。因此,对于一个党员则不能不讲党性,对于一个非党人士则不能在他们的头上高悬党性原则。在列宁当时写作此文时,主要是批评党员不讲党性的做法,这在党的写作事业中主要表现为党的报刊不受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党员作者随心所欲地发表不同于党的观点,然而,党性原则只应限于党内,不应扩大化。然而,在苏联及我国恰恰把党性原则扩大化了,即在一切实领域片面强调党性原则,推至于文学领域,则强调文学的党性原则,让一切文学创作者都遵循党性原则。

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关于列宁“党的文学”、“文学中的党性原则”的思想影响很深。因此,对列宁此文的改译,反对之声十分激烈,如在1996年,在新译文已经通行十余年后,仍有人撰文说什么“在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冲击下”,“不大提文艺的党性原则了”,“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篇名改译和文艺党性原则的不提,遗害极大”^①。甚至2005年仍有人撰文针对新修改的译文,说“写作事业”“自然包括新闻、出版等事业,但主要是指文学事业”,强调“无产阶级文学事业是党的事业的组成部分!必须接受党的领导!”^②由此可见,旧译法的影响有多么深,从实质上看,仍是一种深刻的意识形态影响。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修订旧译文时的情景,这是颇耐人寻味的一段往事。

鉴于《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一旧译法流传甚广,中央编译局在组织修订时做了充分的论证。首先调查了俄文 *литература* 一词在列宁著作中的译例,也考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遇到的译例。

先看一下马恩著作的译例,如《共产党宣言》第三章,小标题叫“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这里的“文献”德文原文就是 *literatur*。另外,恩格斯的一篇重要文章,叫《流亡者文献》,标题中的“文献”德文原文也是 *literatur*。对于列宁文献这样的处理更多,如列宁在1899年写的《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中说:“生活本身要求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创办共同的刊物,出版俄国工人报纸。”^③1900年,列宁在《〈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草案》和《〈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中指出,“首先,必须出版一个共同的党的刊物”,这种党的刊物必须是“坚持原则的、能够从思想上统一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共同刊物”^④。而与此文处于同一历史背景下写就的《论党的改组》一文中提到的 *литература* 就译为“刊物”,这一处理并不是《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修订后的结果,而是第一版就是这么处理的,第二版只是改译为“出版物”^⑤。在第一版各卷中, *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的译法确实不尽统一,但意思上却是比较接近的,绝大多数情况下译为“党的书刊”、“党的报刊”、“党的出版物”等等,唯独在此文中却承袭了以往的译法,译成“党的文学”,也就是选择了一个最容易引起歧义的词义。“文学”一词在我国古汉语中有作为哲学、历史、文学等的通称之义,而发展到近现代,“文学”一词的含义已特指语言艺术、文学作品了。这样,选择“文学”的词义,也就使对列宁一文的理解变窄了。

1981年3月8日中央编译局主持召开了一场讨论怎样重新翻译《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问题的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有十几位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中央编译局为会议提供了如下资料:把《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重译为《党的组织与党的书刊》的译文初定稿,“供内部讨论用”的有关说明资料。据与会者证实,当时会上的十几位专家发言,包括俄文权威翻译家曹靖华,大都不同意重译的“初定

① 雪原:《有感于〈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篇名改译》,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1期。

② 荀春荣:《〈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坚持文学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载《中华魂》2005年第10期。

③ 《列宁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1页。

④ 同上,第286、316页。

⑤ 参见《列宁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页;《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稿”，特别反对改题重译。有几位发言，认为改题重译，在译稿里不提文学问题，不符合列宁原意。俄语名家、毛泽东访问苏联时的翻译师哲说，对《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译文怎么修改与是否重译，他一下子说不清，但他明确说译文是有规范的，俄文译成中文，应该再能从中文回译成俄文，如果把 литература 译成书刊或出版物，就再译不回去俄文的 литература 了。还有几位专家发言表示，现在19所大学的马列文艺选讲用的版本已经对《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做了些改动，又加了注释，可以说问题已经解决了，如果再做修改，也应该依照这种做法，以免引起误会^①。

面对阻力，中央编译局也采用了灵活的办法，这就引出当时负责中央理论宣传工作的领导人胡乔木大力支持和推动改译的一段佳话。1981年10月29日，中央编译局列斯室把小资料《列宁讲的“党的文学”和“无党性的文学家”是什么含义？》送呈胡乔木。很快胡乔木就有了回应，11月3日下午他即让秘书黎虹通过电话转达了自己的意见，从这次电话到11月12日间，胡乔木或者本人或者通过他的秘书先后6次同编译局就翻译问题交换意见，全力支持中央编译局的改译。

11月3日下午电话中，胡乔木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原则，他说：“第一，‘党的文学’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正如‘党的农业’、‘党的工业’、‘党的自然科学’……不能成立一样。只能说‘党的农业政策’、‘党的农村工作’、‘党的工业政策、工作’；第二，关于‘党性’，也搞得很糊涂，讲得比较乱。”11月12日上午8时，黎虹转述了胡乔木11日所写的一封信件的内容，在这封信里比较充分地阐明了他的观点：“请告编译局，《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所以要改译，是因此文自1943年在延安《解放日报》译载以来，因为译文关键地方始终严重不确切，以致成为党在文艺方面‘左’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理论根据。‘党的文学’的提法使人误认为文学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是党的附属物，是党的事业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党应对文学事业进行正确领导，犹如党应对工业、农业、科学教育的发展进行正确领导一样。但工业、农业、科学教育仍属于整个社会、整个人民和国家，并不因为有党的领导，就成为党的工业、农业、科学教

育，成为党的事业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在一定意义上说，整个党的事业也是整个社会发展和整个人民生活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由于文学基本上是个人的创作，党在文学中不能发号施令，只能提出号召和建议，做出评论，通过作协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并通过出版、制片等国家行政进行适当调节。但党对自己的报刊言论和党员个人的言论却可以也应该实行一定的控制，因为那是真正的党的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故此文的误译影响十分重大，必须改正。”实际上，胡乔木同志的意见点出了关于旧译与新译的实质，即有什么“党的文学”一说。

胡乔木还在具体译法上提出自己的意见，11月5日和9日黎虹通过电话转达了胡乔木的有关意见：“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重译，标题可否改为《党的组织和党的言论》，译‘著作’或‘作品’都不好。文章中的‘文学’不一定都改译‘言论’，根据不同情况，文字分别处理。”“‘文学’是多义词，‘党性’也是多义词，特别是中国流行的‘党性’的用法更具有严重的意义，包括对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等等。‘党性’没有这么多的含义。中国的古语说，无党无偏，或者群而不党。用‘无党性的著作家’也不能顺理成章，因为著作家可以在某些地方无倾向性。似乎用‘无立场的著作家’更清楚些。请考虑。”^②

由此可见，胡乔木同中央编译局共同探讨的，不仅仅是一个翻译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如何调整党对文艺的政策问题，关系到党对文艺政策的指导方针。仅就翻译而言，胡乔木就译法以至于译名提出的不同方案，编译局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的采纳了，有的并未采纳。经过反复推敲，修订后的译文出来了，标题是《党的组织和党的书刊》。1982年《红旗》杂志第22期发表的译文，是又经过修订的，标题改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也即以“出版物”代替“书刊”。后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十二卷所载的译文，基本采纳了这个译文，只正文中有若干小的改动。

^① 黎辛：《博古与〈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翻译》，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1期。

^② 丁世俊：《记一篇列宁著作旧译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修订》，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2期。

198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是年6月25日,胡乔木在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闭幕后的招待茶会上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发表讲话,提到了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问题,他说:“中央考虑不再用‘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些提法,而改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①而“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些提法正是出自毛泽东的“讲话”。抛弃这些提法,是中央文艺政策在新时期的重大转变。为了促进文艺政策的转变,在这次中国文联全委会上,特意散发了列宁此文的新译文《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胡乔木讲为什么要调整中央的文艺政策,就是以编译局为什么要修订列宁此文旧译文的话题引起的。他在讲话中指出:“有的同志说,‘党的文学’这个译法已经流行这么久了,现在忽然要改成‘党的出版物’,会引起很大混乱。”但是,他接着说:“我相信,如果我们是一个诚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是一个公正的,不带偏见的,有历史眼光的,那么我们读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所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中译文为什么需要修改?》^②,一定会同意他们的意见。因为这个说明理由很充足,是无法辩驳的。”^③有关理由,实际上前面都已论述过,不再赘述。

二、爱国主义是什么

关于爱国主义,列宁的一句话曾经非常有名,经常被引用,甚至被用于定义。这句话是这样的:“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④

但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进行修订时,这句话被改译了,改译的文本是:“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⑤

先从语言本身来看这句名言。这句话的俄文原文是: Патриотизм — одно, из наиболее глубоких чувств, закреплённых веками и тысячелетиями обособлённых отечеств... 从俄语语法结构看,这句话由一个主句和一个付句组成。主句说:爱国主义是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付句是

讲这种感情的形成:这种感情是由于一个个祖国彼此隔离了几百年几千年而固定下来的。

列宁的这句话出自他于1918年11月20日所写的《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一文。对于这一“定义”,在中文第二版修订之前共有三个译文。最早是由匡亚明翻译的,收在《新华日报》华北分馆1941年4月1日出版的《农村工作论文集》一书中;中央编译局图书馆馆藏的是大众日报社1946年12月再版的该版本,书名为《论农村工作》,收录此文的标题是《毕梯力姆·苏洛卿的宝贵的自供》。当时这一句的译文是这样的:“爱国心是一种沾染最深的感情,是千百年来许多国家分立存在的事实所熏陶出来的。”^⑥应当说,这个最初的译文是符合俄文原意的。第二个译文是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中文版本《论工农联盟》中提供的。当时的译文是:“爱国主义是在独立存在的祖国的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中巩固起来的最深感情之一。”^⑦这一译文基本上也是正确的。第三个译文就是我国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一版第二十八卷的译文。这个译文在《列宁选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中略有不同,第二版只做了极小的改动,即把“巩固起来”改成“固定下来”^⑧而已,并没有本质的改动。

中文第二版在修订译文当中发现了这句话是错译,在经过讨论后最终形成了新的译文。新译文改正了两个错误:一是改正了原来对关键词“彼此隔离”的遗漏,原来把“彼此隔离”错译成“自己”;二是改正了原来弄错了的语法结构,原来把“由于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感情”译成“对……祖国的感情”。这句译文的修订,在翻译本身上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争论,因为事实如此。产生影响的是如何理解列宁这个爱国主义“定义”的特定含义,这是一个事关理论的问题。

① 《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②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中译文为什么需要修改?》,载《红旗》杂志1982年第22期。

③ 《胡乔木谈文学艺术》,第241—245页。

④ 《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8—169页。

⑤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页。

⑥ 《论农村工作》,大众日报社1946年12月版,第11页。

⑦ 《论工农联盟》,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6年中文版,第377页。

⑧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8页。

《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①这篇文章写于1918年11月20日,其大背景是苏维埃俄国成立不久后即面临的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开始阶段。在这一阶段,列宁十分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列宁十分现实地指出,在国内局势紧张的情况下,中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因此苏维埃政权也要重新思考对中农、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

列宁在文章中简单地回顾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苏维埃政权的不同态度。在苏俄同德国谈判签订条件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持坚决反对态度。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巩固苏维埃政权,也为了获得喘息时机,积聚力量,等待世界革命的到来,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苏俄首先提出同德国进行和谈并同德国签订了包含割地赔款等苛刻条件的条约。在和谈进行过程中及和约签订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外都出现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存在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反对派和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不战不和派。而在党外,当时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从其“爱国”情绪出发,认为这是背叛祖国,因而坚决反对和敌视布尔什维克。然而,事情的发展证实了列宁当时的选择对于保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必要的。《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苏维埃政权利用宝贵的喘息时间整顿被连年战争破坏殆尽的国民经济,组建了工农红军,巩固了工农联盟,1918年11月德国爆发革命后,德国在一战中战败,苏俄得以废除了《布列斯特和约》。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皮季里姆·索罗金声明退出社会革命党,声明不问政治,实际上这正是一种政治表态,正如列宁所说的,实际上表明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从敌对转为中立”。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应该调整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策略,以使革命形势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而这一点正是列宁写作这篇文章的主旨。

文中所引出的“爱国主义的话题”,只是针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原因。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表现出了自己特有的爱国主义热情,然而列宁指出,这一时期是一个不得不“同爱国主义断然决裂的时期”,因为为了世界无产阶级

革命的最高利益,需要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对这一点,理解起来是有一定困难的,列宁也承认只能期望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懂得这一点,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不能理解这一点的,因而他们把布尔什维克的做法看作“幻想、狂热和冒险”,看作“沉醉于指望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这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毫无根据的想法”,看作“牺牲亿万人民显而易见的现实的利益”。因此,列宁认为,由《布列斯特和约》“引起的痛苦、怨恨、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说是可以理解的呢,因为列宁说,“小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更加爱国”,这就点出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狭隘性质,也就是说他们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由于彼此隔离在一个个祖国里,而只知道祖国眼前的利益。在同一时期的文章中列宁也反复谈到了这一问题并且论证得更为充分。1918年11月27日列宁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做《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时阐述道,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比较,它是最爱国的。大资产阶级比较国际化,小资产阶级不大活跃,同其他国家很少联系,也没有卷入世界范围的商业周转。……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曾经不得不反对这种爱国主义”^②。5个月之后,1919年3月18日,列宁在俄共八大上做《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时再次论证道:“爱国主义,这正是小私有者的经济生活条件造成的一种感情。资产阶级比小资产阶级更国际化。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当苏维埃政权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全世界的革命看得高于一切民族牺牲(不管这种牺牲是多么惨重)的时候,我们就碰到了这种爱国主义。”^③从列宁的分析看到,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可以理解但是应该加以反对的。

进一步地,当德国战败,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同样强迫德奥人民接受比《布列斯特和约》更苛刻的条件,并同样来充当扼杀弱小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的宪兵和刽子手时,这些事实就迫使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从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转为中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185—193页。

② 同上,第207—208页。

③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页。

立,甚至转为支持。列宁看到这一转变,强调要及时地利用这一转变,如果从对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态度上说,就不仅要对其加以理解,而且要加以引导和利用,列宁说,“谁不善于看到和利用这一点,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蹩脚的社会主义者”^①。也就是说,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表现为它以一定的条件为出发点,在其爱国主义的表现上即是如此。因此,列宁指出要对小资产阶级持灵活态度,要依具体的历史情形和表现来做出应有的评价。

关于“爱国主义”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人认为很难对它下定义,因为很难找到一个核心构成来定义它。而我们一般所谈论和提倡的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首先是一种民族利益和感情。而这一点,列宁这句曾被错译的“爱国主义定义”就很符合这一要求,被我们国人广泛引用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于我们的中央文件也不例外。1983年7月16日,全国各大报发表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此文就引用了列宁的“定义”,并对“定义”做了诠释。文中说:“列宁曾经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人们对祖国的这种神圣的感情是与他们的共同利益相联系的。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还是按照地域划分为国家的,这种情况还将在人类历史上持续很长很长的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人民总是要在祖国这个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特定的环境中进行各种不同的斗争,首先是竭尽全力地为祖国和人民的前途而斗争。这就是千百年来爱国主义所以能够成为教育和鼓舞人们起来斗争的强大的精神力量的社会历史原因。”如果不引用列宁的“定义”,单纯来看也没什么错。但是,如果结合列宁有特指条件和意义的“定义”,那么这样的论述就只能看作是不恰当的发挥,偏离了列宁思想的本意。

说起来也非常凑巧,正是在这一文件发表的当年,在重新校订《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一文时发现了这句错译。对此,中央编译局本着负责任的科学态度向社会加以说明。首先,以中央编译局列斯室的名义写了一份材料,对译文的错误以及列宁“定义”的内涵和背景做了详细说明,上报

中宣部理论局并转发各有关单位。但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并使用方便的经典名句的改动并不能一下子令人们接受。1985年10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对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一处论述的译文的订正》一文,10月25日,《人民日报》的《报刊文摘》又加以简略转载。10月间,载有“爱国主义定义”新译文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十五卷问世。由此,一段关于新旧译文谁是谁非的公案终于尘埃落定。

因为译文的改动,无法引经据典了,有的人表示遗憾。1987年6月11日,《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爱国主义与爱国主义情感》的文章说:“列宁的一句名言‘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曾被译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并以此作为‘爱国主义’概念的精辟定义而广为流传。但是自从这句话的准确译文发表以来,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一般文章,均很少提到,大概出于引用起来不太方便的缘故。”这段话典型地表现出作者的惋惜与遗憾。其实这涉及如何引用经典的问题。我们的学术研究经常以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来为自己的观点服务。但是,这种引用常常出现问题,如果是望文生义,这还算是理解问题,如果是断章取义或者歪曲,则是学术目的不端的问题了。

事实上,在此句译文修改后,学术界毕竟出现了基于列宁本义的关于列宁爱国主义思想的研究。如有的文章根据列宁谈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爱国主义,而论述了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特征^②;有的文章回顾了列宁对于爱国主义的观点,着重分析了第二国际社会党人在一战中“保卫祖国”式的爱国主义,阐述了列宁对这种虚假的爱国主义的批判及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③。应该说,这都是改正错译、还原本意的结果,说明改译并未限制学术研究,反而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

(责任编辑 李淑华)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188页。

② 参见徐隆彬:《列宁关于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理论初探》,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1991年第7期。

③ 参见钱可威:《浅析列宁的“爱国主义”观》,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On a New Translation of Two Important Names in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enin in Chinese

GAO Xiaohui

Abstract: The first edition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enin in Chinese started to be translated in 1953 and completed in 1959. More than twenty years later, the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 decided to thoroughly collate the first edition of the Works because they found some mistakes in the translation and there were some new achievements of the Works published by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process of collation, there were two retranslated parts: one was retranslating “the literature of the Party” into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Party”, another was “what the patriotism is”. The retranslation of the two parts is of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a deep study of the classical Works of Lenin.

Key words: Lenin; Collected Works of Lenin; publications of the Party; patriotism

Второй перевод Пол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Сочинений В.И. Ленина на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и новые варианты перевода двух важных выражений

Гао Сяохуй

【Аннотация】 Работа над первым переводом Пол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Сочинений В.И. Ленина на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началась в 1953 году и завершилась в 1959 году. Через 20 с лишним лет Центральное бюро редактирования и переводов при ЦК КПК принимает решение произвести редакцию первого издания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Это решение было вызвано обнаруженными после публикации первого издания проблемами и новейшими достижениями, связанными с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м в СССР полным Собранием сочинений В.И. Ленина. В процессе редактирования был сделан новый перевод двух важных выражений, первое выражение - 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торое - что такое патриотизм. Процесс изменения перевода этих двух выражений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о важной роли перевода классическ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Лен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И. Ленина; 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атриотизм